



教育部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

2007 年度

规划基金项目

中国

大学文化百年

研究系列丛书

正气完人的精神家园

——苏州大学文化研究

范培松 张颖 著

教育部

中国

大学文化百年

研究系列丛书

正气完人的精神家园

——苏州大学文化研究

范培松 张颖 著

ZHENGQI
WANRENDE

JINGSHEN
JIAYUAN



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

HIGHER EDUCATION PRESS BEIJING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正气完人的精神家园：苏州大学文化研究 / 范培松，
张颖著。—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3
(中国大学文化百年研究系列丛书 / 王冀生主编)

ISBN 978-7-04-030849-5

I . ①正… II . ①范… ②张… III . ①苏州大学 -
校园 - 文化 - 研究 IV . ①G649.285.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34499 号

策划编辑 梁宝贵 责任编辑 谷轶波 装帧设计 刘晓翔 张楠 协办 王洋 责任校对 杨雪莲
责任印制 朱学忠

出版发行 高等教育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4 号 邮政编码 100120 购书热线 010-58581118

咨询电话 400-810-0598 网址 <http://www.hep.edu.cn> <http://www.hep.com.cn>

经销 蓝色畅想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网上订购 <http://www.landraco.com> <http://www.landraco.com.cn>

畅想教育 <http://www.widedu.com>

印刷 北京信彩瑞禾印刷厂 开本 787×960 1/16 印张 26.5 字数 330 000

版次 2011 年 3 月第 1 版 印次 201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51.80 元

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请到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物料号 30849-00



《中国大学文化百年研究系列丛书》
编辑委员会

顾问 顾明远 潘懋元
主任 王冀生
副主任 赵存生 胡显章 王 霖

《中国大学文化百年研究系列丛书》
专家论证委员会

顾问 顾明远 潘懋元
主任 方惠坚
副主任 王英杰 王义遒 李延保 查卫平

总序

我国近现代大学仅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它植根于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文化底蕴之中，产生于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危难时刻，经历了跌宕起伏的政权更迭和错综复杂的文化冲突过程，发展于中华民族重新走向振兴的伟大时代。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引下，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把握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深入开展中国大学文化百年研究，认真回顾总结一百多年来我国近现代大学发展、变革的历史进程、文化脉络和基本经验，以史为鉴、面向未来，为实现中国特色大学理想而奋斗，是我们面临的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课题。

一、我国的近现代大学离不开中国的历史和文化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文化底蕴博大精深，有着优秀的教育传统。我国的近现代大学制度虽是舶来品，其开端是由西方引进的，但它是移植和生长在中国的历史和

文化土壤中的，因此，它离不开中国的历史和文化。

一个伟大的民族必然有自己伟大的民族文化，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创造出光辉灿烂的文明，并且长盛不衰，就在于它有伟大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春秋战国时期我国曾经出现诸子百家学术争鸣的繁荣局面，但是自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之后，儒学奠定了其在中国传统社会的正统地位，后来，儒学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历经变迁，但是，作为儒学的精华——“贵仁”和“重礼”却是一以贯之的，长期凝聚着整个中华民族，培育着她的人民，并且造就了中华民族的辉煌。

我国先秦时期的《大学》是第一篇系统地论述儒学教育理想的哲学经典。《大学》开宗明义的第一句话就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由此可见，“明德济世，修齐治平”是儒学教育理想的核心。“明明德”，就是要求通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特别是通过“修身”，使受教育者成为道德高尚的君子和士。“亲民”，就是要求受教育者在成为道德高尚的君子和士以后，亲近、爱恤人民，以天下为己任，齐家，治国，平天下，服务和推动社会前进。“止于至善”，就是要求受教育者无论是“明德济世”还是“修齐治平”都应当尽可能地达到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至善至美的境界。

应当充分肯定，自汉武帝之后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及其“以伦理道德为本位”的教育理想对培养君子、士的人格理想发挥了极其重要的历史作用，这是我们为实现中国特色大学理想而奋斗的根基所在。

二、近代以来我国教育战线的思想解放和改革创新

近代以来，面对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猛烈轰击和现代文明的严峻挑战，经过长期的艰苦探索，我国逐渐明确了以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为主体，批判地继承和发展儒学教育理想的精华，在世界多元文化激荡交融中发展中华民族新文化和创建中华民族新教育的战略目标，这是我们为实现中国特色大学理想而奋斗的根本方向。

为了实现这个战略目标，“从科举到学堂”是20世纪初我国教育战线进行的一次重大的思想解放和与之相适应的高等教育的划时代变革，众多学贯中西的大师和教育家们高举“教育救国”的旗帜，在我国积极传播以“通识教育，学术自由，教授治校，教育独立”为主要内涵的西方大学理念，效法西方，为在我国建立近现代大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值得强调的是，这一时期我国近现代大学的成长，并不只是北大、清华、南开之二三家，蔡元培、梅贻琦、张伯苓之二三人，而是有一个较大的群体，如竺可桢之于浙江大学、唐文治之于上海交通大学、罗家伦之于中央大学、马相伯之于复旦大学、萨本栋之于厦门大学、胡庶华之于湖南大学、熊庆来之于云南大学、何炳松之于暨南大学、钟荣光之于岭南大学等等。他们的一个共同追求是，继承儒家文化中培养君子、士的人格理想，使之与现代知识分子的养成衔接，谱写了我国近现代教育史上一段辉煌的篇章。但是，由于种种极其复杂的原因，正如陈平原教授深刻地指出的那样，我国的大学成功地移植了西洋的教育制度，却谈不上很好地继承中国人古老的“大学之道”。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毛泽东提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

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观及其在解放区进行教育改革试验的基础上，我国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体系进行了艰苦的探索。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先后发表了《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总结了全面学习苏联的经验和教训，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制定了一整套“走自己的道路”的指导方针，创造性地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科学文化艺术的方针和“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教育方针，接着又于1958年创造性地提出“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广大教育工作者在这些方针的指导下开展了广泛的教育改革试验。1961年还在科学总结正反两个方面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制定了《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理念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为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体系奠定了初步的基础。“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经过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在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的“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战略思想指引下，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教育战线进行了又一次重大的思想解放和与之相适应的又一次高等教育的划时代变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进一步确立并巩固了社会主义高等教育制度。我国高等教育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式发展，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取得了初步成效，我国大学走上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光辉道路，为30多年来我国的经济腾飞、国力增强、生活幸福和社会和谐提供了强大的人才和智力支撑。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审议并通过《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时明确指出：“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经过

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我们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建成了世界最大规模的教育体系，保障了亿万人民群众受教育的权利……我国实现了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大国的转变。”^[1]

在充分肯定近代以来我国教育战线已经取得的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的同时，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由于种种极其复杂的原因，以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为主体，批判地继承和发展儒学教育理想的精华，在世界多元文化激荡交融中发展中华民族新文化和创建中华民族新教育的战略目标至今仍然没有完全实现，需要我们为实现这一伟大目标继续奋斗。

三、我国大学迫切需要实现新的文化觉醒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人类社会逐渐进入以经济全球化为基本特征的崭新时代，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改革在前进的道路上日益明显地暴露出众多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即大学文化和精神缺失现象，突出表现在人文精神的滑坡，办学目标的功利化倾向，官僚化气息的侵袭严重和缺乏鲜明的办学特色。时代呼唤我国大学实现新的文化觉醒，我们应该揭示大学文化和精神缺失现象在我国出现的深刻根源，对大学应有的文化品位和崇高理想进行再认识，坚定不移地继续为实现中国特色大学理想而奋斗。

众所周知，人类社会曾经长期把人的贪欲视为洪水猛

[1] 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中长期教育改革发展规划纲要 . http://www.gov.cn/lphd/2010-06/21/content_1632787.htm. 2010-08-20.

兽，宋明儒学提出“存天理，灭人欲”，古希腊柏拉图认为，有理性是人和其他动物之间的本质区别。但是，19世纪中叶以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随着人类社会逐渐进入以经济全球化为基本特征的崭新时代，当前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一种以崇尚物质、忽视人文为主要特征的全球性文化生态危机。其实质是一种信仰危机，这种信仰危机也影响了当今世界的高等教育和大学，部分大学出现了人文精神的滑坡和办学目标的功利化倾向，以“促进人的发展为目的”的人文关怀和以“为真理而献身”的独立精神为核心的大学精神传统也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和冲击。由此可见，当前在我国出现的这种大学文化和精神缺失现象不是孤立的，它是当前世界范围内出现的大学文化和精神缺失现象在我国的深刻反映。

更为重要的是，由于我国曾经长期处于封建社会，封建思想根深蒂固，近代以来文化革新进行得并不彻底，新中国成立以后又长期受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思想的严重干扰和实行高度集中的行政领导管理体制，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也产生了不少负面效应，所以，当前在我国出现的大学文化和精神缺失现象不仅是世界范围内出现的大学文化和精神缺失现象在我国的深刻反映，而且有着深刻的国内根源，特别是官僚化的影响和缺乏鲜明的办学特色表现得比较突出。

必须强调指出，尽管当前大学文化和精神缺失现象在我国的出现有着极其复杂的国际、国内的深刻根源，但是，最主要的根源还是由于我国一些大学没有能够理智地应对外部世界种种新的挑战和诱惑，缺乏大学应有的文化品位和崇高理想，有的大学甚至出现了附庸化、工具化和庸俗

化的倾向。

四、为实现中国特色大学理想而奋斗

面对当前在我国出现的大学文化和精神缺失现象，我国应当确立什么样的大学理想观呢？国学大师钱穆先生1964年在新亚书院毕业典礼上对学生说过一番话，人生有两个世界，一是现实的俗世界，一是理想的真世界。此两者该同等重视，我们该在此现实俗世界中建立起一个理想真世界。我们都是现实世界中之俗人，但亦须成为理想之真人。钱穆先生的这番话讲出了一个既简单又深奥的道理，他让我们明白了在社会现代化和世俗化的过程中，人们既要面对“现实的俗世界”，又要坚守“理想的真世界”，正确的态度应当是从“现实的俗世界”出发继续为实现中国特色大学理想而奋斗，以达到“理想的真世界”。这正是当前我国教育战线众多有识之士坚守和追寻的道路。

为了坚守和追寻这条道路，近一个时期以来在我国高等教育界悄然兴起了一个大学文化问题研究学术思潮。通过研究，人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大学不仅是一种客观物质的存在，更重要的是一种文化存在和精神存在，大学文化建设的灵魂是大学应有的文化品位和崇高理想的确立。“育人是大学之本”和“科学是大学之根”是早已被实践证明了的两种大学哲学观，“育人是大学之本”是大学存在的第一要义，“科学是大学之根”是大学存在的核心价值，它们共同构成了大学存在的根本以及大学应有的文化品位和崇高理想的基本内涵。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新的实践证明，面对以

崇尚物质、忽视人文为主要特征的全球性文化生态危机以及其他外部世界的种种挑战，一所不能坚守“育人是大学之本”和“科学是大学之根”的大学是缺乏文化品位和崇高理想的大。时代呼唤有灵魂的大学。

“文化是大学之魂，是大学赖以存在的精神支柱”，就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在我国大学文化问题研究学术思潮深入发展过程中提出的一种崭新的大学哲学观。作为大学赖以存在的精神支柱，“文化是大学之魂”不仅深深地蕴涵在“育人是大学之本”和“科学是大学之根”之中，而且是时代精神的深刻反映。由此可见，“育人为本，科学为根，文化为魂”是三位一体的大学哲学观，它的提出是高等教育哲学在当代中国的新进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为我们建设有灵魂的大学奠定了新的更加坚实的哲学基础。

长期以来，在我国，人们常常是从政治的视角来看待“中国特色”，把“中国特色”和“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称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近一个时期以来，我国有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认为“中国特色”不仅有政治内涵还有文化内涵，主张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坚持“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以人为本自主创新和谐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观与普遍意义上的“大学之魂”的有机结合，以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为主体，批判地继承和发展儒学教育理想的精华，学习、借鉴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在世界多元文化激荡交融中加强中国特色大学文化建设，特别是中国特色大学精神文化和现代大学制度建设，以文化创新促进教育变革和大学创新，坚定不移地为实现中国特色大学理想而奋斗，这是当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

“中国大学文化百年研究”是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高等教育出版社联合组建的“大学文化研究与发展中心”牵头，由一批著名大学共同承担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2007年度规划基金项目，是一项具有基础性、战略性和前瞻性的重大课题。中国大学百年文化是一个伟大的宝库，这些大学发展、变革的文化脉络和历史进程是中国大学百年文化的一个缩影，认真开展这批大学的“大学文化个案研究”是“中国大学文化百年”课题研究的基础工程，其主要要求是在全面占有史料和深入进行史实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典型的人物、事例和环境，以文化为主线，以办学理念和大学精神为重点，以杰出校长、知名教授、优秀学生为主体，挖掘和整理学校在长期教育和办学实践中积淀和创造的具有鲜明个性的深厚的文化底蕴、形成的办学特色和取得的基本经验，以史为鉴，提高自觉，在文化传承和创新的基础上为实现中国特色大学理想而奋斗。为了确保参与课题研究各校“大学文化个案研究”的成果质量，“大学文化研究与发展中心”先后组建了《中国大学文化百年研究系列丛书》编辑委员会和专家论证委员会。两个委员会的顾问顾明远、潘懋元两位先生和主要专家在《中国大学文化百年研究系列丛书》编辑、出版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积极的作用，在此，我代表课题组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经过将近五年的艰苦努力，在一批百年老校和若干所有重大影响的著名大学撰写的思想性强、史料翔实、文脉清晰、结构优化、论述深刻、文字精练、图文并茂和可读性强的文化精品的基础上编辑的《中国大学文化百年研究系列丛书》的出版，是我国高等教育界和大学人的一个创举，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文化价值。

为实现中国特色大学理想而奋斗，任重而道远，需要我们长期坚持不懈地努力。

总课题组组长 王冀生
丛书总主编

2010年7月

序 言^[1]

王卓君

文化自觉是在文化实践、文化创造和文化反思中所体现出来的一种文化主体意识。自从费孝通先生首倡，并经过他本人和其他学者的深入探讨和阐释，已不再是一个孤立的概念，而已成为了一种文化观、一种富于深刻意涵的文化理论。在当今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格局中，只有唤醒文化自觉意识，并在全社会蔚成风气，一个民族的伟大复兴才能获得坚实的基础和可靠的精神保证。在人类文化发展史上，大学不仅以人才和知识贡献社会，更成为了人类新思想、新理论和新文化的发源地，民族优秀文化与世界先进文明交流借鉴的桥梁纽带。以文化自觉的理论为指导，积极提升大学文化自觉，并以此引领、推动，进而达致全民族的文化自觉，对于当前我国高水平大学建设和民族文化创新、和谐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该文是苏州大学党委书记王卓君教授出席“第四届大学文化高层论坛”所作发言，后发表于《中国高等教育》2010年第1期。

一、全球化境遇下的文化冲突与大学文化自觉

全球化作为一种历史过程，一般认为发源于 15 世纪西方国家的海外扩张，进入 20 世纪以来，这种趋势日益显著，正如吉登斯所言“全球化是一个必定在社会科学辞典中占据关键地位的术语”，^[1] 全球化已成为当代人所面对的重要生存境遇。全球化虽然起源于经济领域，并首先表现为经济的全球化，但是全球化绝不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全球化作为一种社会历史过程，与其他社会历史过程一样，既是一个客观的必然进程，也是人的主体营造过程；既非人的随心之所为，也不像自然过程那样自发行进，它总是在一定的价值主体推动下，以某种价值为其向度的。质言之，任何一种全球化的实践或理论都必定是负载着某种价值、某种文化。^[2]

自亨廷顿发表《文明的冲突》一文以来，东西方文明关系及世界未来文化图景就成为国际学术界争论的热点，进一步凸显了全球化进程中的文化悖论：在经济全球化的态势下，人类文化是趋于一体化、同质化，还是趋于多元化、分裂化？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是民族文化认同的危机，还是文化认同的机遇？各种文化的冲突是此长彼消，还是走向共存共荣？而在当下，全球的文化冲突已越来越严重地影响着人类的未来可持续发展。文化霸权主义者依仗自己的经济、政治、科技优势，企图以自己的意识形态一统天下。他们认为自己的文化是最优越的，具有全世界的普适性，

[1] 吉登斯. 现代性的后果 [M].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

[2] 鲁洁. 应对全球化：提升文化自觉 [J].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3（1）.

应该统治全球。与之相对，“文化割据主义”者也不甘示弱，认为自己的文化绝对优越，禁止讨论其可能存在的缺点，反对和其他文化交往，唯恐受到污染，采取隔绝和孤立政策、畏惧新的发展、压制不同意见，扼杀本文化内部求新、求变的积极因素，无所不用其极地固守自己的既得利益和旧日的一统天下。

大学作为保存、传播和创新知识的机构，随着知识荷载的价值不断垒砌，首当其冲地成为了文明冲突的先锋领地。各种文明以知识为载体在这里聚集、交汇和对话。然而，在这个交流的舞台上，各文明主体之间话语权力的分配已经超出了人们对文明的差异性存在事实的判断。西方文明以其拥有的经济效用、强势知识成为了舞台上的主角，而那些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文明形态则在这个过程中不断被边缘化，或干脆被挤出舞台。世界文明的舞台上角色出现了强势和弱势的分野，不断上演着达尔文式的同化演变和异化纷争。发展中国家如果想走上这个舞台，则必须具有与舞台上文明国家沟通的基础，那便是体现西方文明和价值观的文化背景、思维方式和价值观。于是，斯皮瓦克所言的“后殖民化”的通道便悄然筑成了。阿特巴赫进一步指出：第三世界国家获得书籍的不易、出版社的地理位置、国际贸易模式以及科学出版所用文字，都强化了第三世界大学的边缘地位。国外援助项目、文化交流活动又延续了工业化国家的教育和知识结构的依附关系的存在。^[1]发展中国家的大学，在因处于国际知识体系中的弱势地位而

[1] 菲利普·阿特巴赫. 比较高等教育：知识、大学与发展 [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38.